

经典作家

纪念

王瑶

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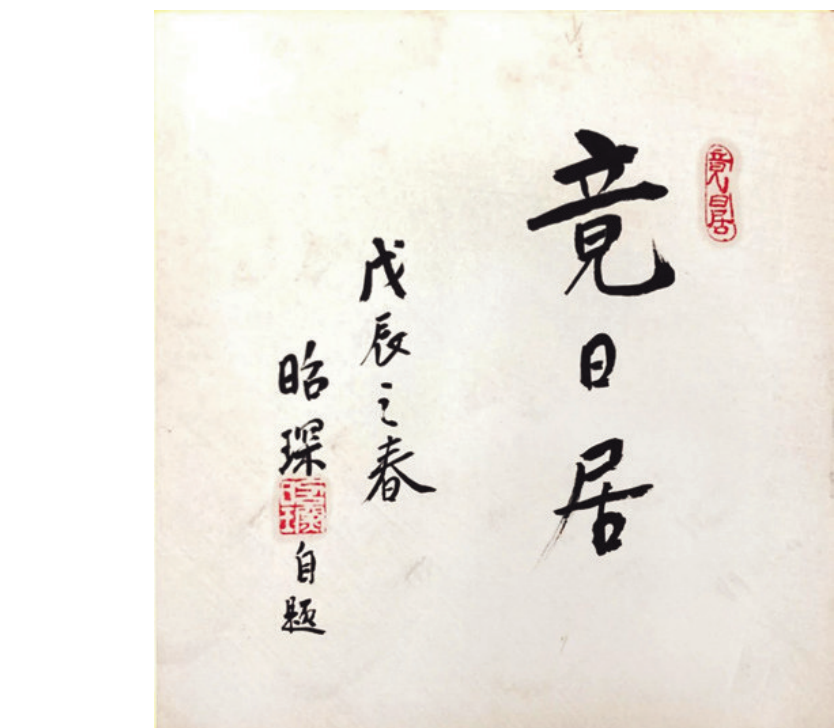


王瑶，字昭琛，山西平遥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我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奠基者、学科的“第一代学人”。他撰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我国具有完备系统的现代文学史专著之一，主持创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是学科重要的机构平台，所指导的学生钱理群、温儒敏、吴福祥、陈平原等，均成为新时期学科重要的有生力量。今年是王瑶先生诞辰110周年，为纪念其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作出的杰出贡献，本报特邀钱桂梅、刘勇、李国华三位学者撰写文章，阐释其学术成就，感怀其学人风采。

——编者



王瑶和学生们的合影：前排左起依次为钱理群、王瑶、吴福祥，后排左起依次为陈平原、张致瑞、温儒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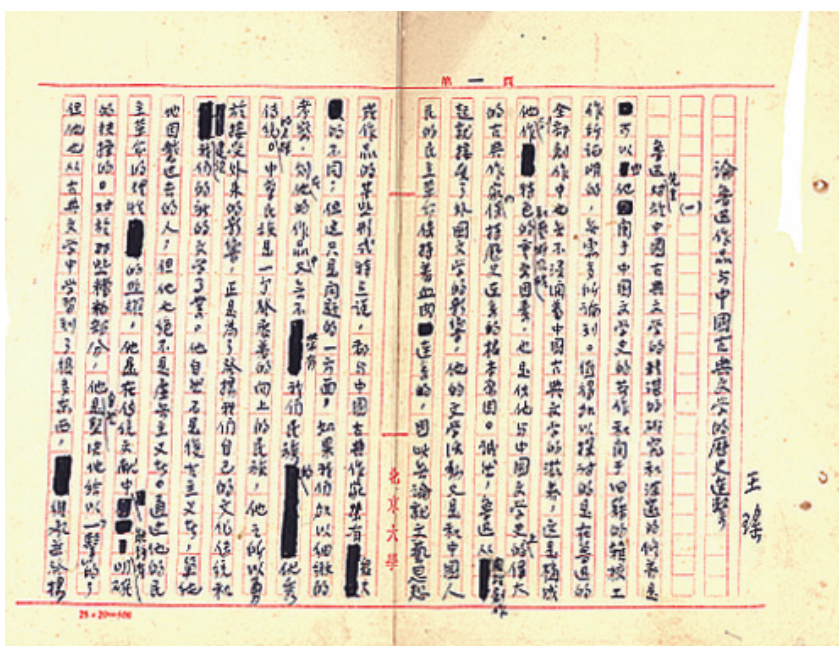
“竟日居”是王瑶晚年书斋，系其时居所楼榭，因拆学所得因得为王瑶晚年手书“竟日居”落名

本版图片由中国现代文学馆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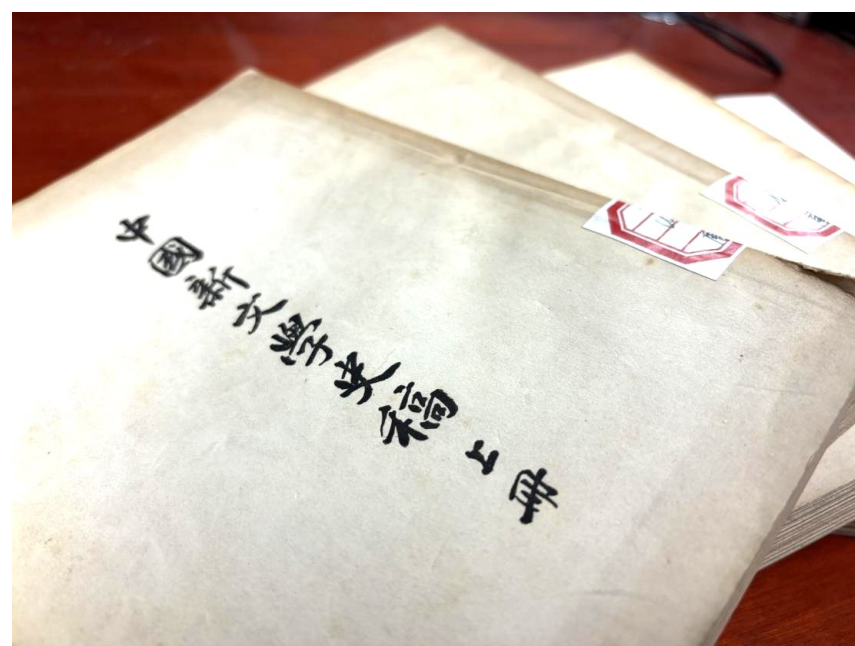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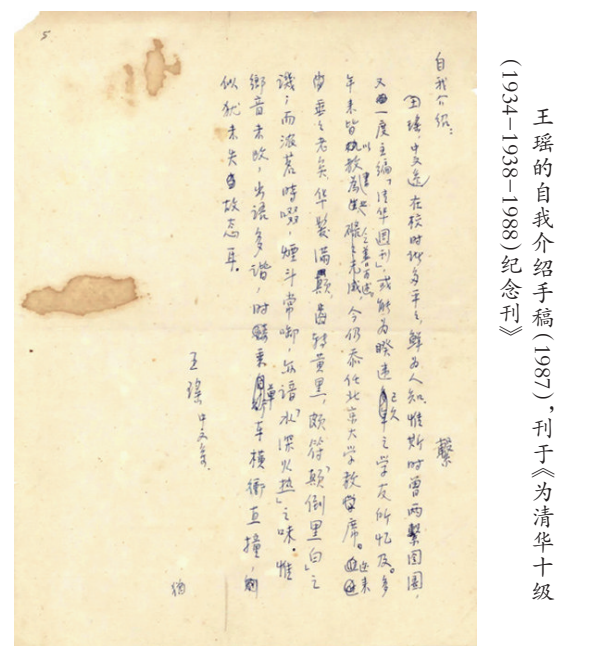
经典作家

王瑶的意义：一个人与一个学科

□贺桂梅



《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手稿》(1956年)



王瑶的自我介绍手稿(1987)，刊于《为清华十级》(1934—1938—1986纪念刊)

早设立的现代文学教研室的学科带头人。

《王瑶画传》提到，王瑶晚年常戏言“我是清华的，不是北大的”。这一说法客观地显示出1930—4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学科初创时期两所高校的不同风格，但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北大，事实上代表的并不仅仅是某一高校学派，而集中了当时中文科系的全国力量。从代际关系上看，王瑶属于第一代“科班出身”的文学研究者，这是他不同于亲身参与了新文学运动的鲁迅、朱自清的地方。王瑶说自己是“师承法鲁”，他和自己的老师朱自清一样，也可以说是新文学第一代学者鲁迅的传人。如果说朱自清的新文学研究为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奠定了研究体例的基础的话，那么鲁迅影响王瑶的则是学术研究的方法、格局、气象与趣味。他的《中古文学史论》深究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1927)的影响，由此完成了迄今仍极具学术高度的中古文学史研究。

更重要的是，王瑶深得文学史家鲁迅的精髓，并创造出他独有的文学研究视野和格局。在几个关键维度上，王瑶形成了自己作为文学史家和学科建设者的主要风格：其一是贯通古今。孙玉石概括王瑶学术成就的“三个高峰”，也是一门历史科学，“研究的是文学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重要文学现象上下左右的关联性。这就使得如何兼具历史的考据与现代的批评，如何既有史料的坚实基础也有史识的判断能力，成为王瑶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要素，进而形成了综合文史的厚重宏阔格局。

1947年林庚的《中国文学史》出版，王瑶在评论文章中提出“诗”的研究和“史”的研究这两种区分，显示出他更重研究的建构性，成为一种历史研究的特点；而如何理解“史”的特点，王瑶在1950年代关于平南伯的研究系列文章中，则主张综合批评与研究，重视考据而不囿于考据，将“释古”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目标，“与墨守乾嘉遗风的京派不同，也和空疏泛论的海派有

别”，这是王瑶当时理解的“清华学风”，在尊重文学作为文艺科学的基础上，强调文学研究对于历史研究科学性，这构成了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基本特点，也体现了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的基本内涵。由此，中国文学研究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的话诗、选本和考据，也不同于西方纯粹科学性的历史传统。

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过1950—60年代“理论”的时期，1980—90年代偏重文学性的批评和作家作品研究，近10多年来则形成了“文坛热”“史料整理热”、文史、论三者各有偏重。重新回顾王瑶对文学史基本性质的理解，对于推进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无疑有重要启示意义。

王瑶研究的第三个特点，是兼重现代性与民族性。他打破了简单的现代与古典、新与旧的对立，既关注传统文学的现代化，也重视西方文学资源的民族化，由此表现出颇为鲜明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主体性风格。在普遍关注文学现代化维度的20世纪，王瑶的特点是他没有将现代文学视为抽象的“世界文学”，而是立足中国文学发展的主体性特点，在古今中外的格局中定位新文学的现代性意义。他写过多篇宏论论述现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也是一门历史科学，“研究的是文学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重要文学现象上下左右的关联性。这就使得如何兼具历史的考据与现代的批评，如何既有史料的坚实基础也有史识的判断能力，成为王瑶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要素，进而形成了综合文史的厚重宏阔格局。

其二二是综合文史。王瑶曾在不同时期多次界定“文学史”研究的特点和意义，他反复强调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也是一门历史科学”，研究的是文学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重要文学现象上下左右的关联性。这就使得如何兼具历史的考据与现代的批评，如何既有史料的坚实基础也有史识的判断能力，成为王瑶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要素，进而形成了综合文史的厚重宏阔格局。

缝密历史的针脚 留下文学的魅力

——王瑶的文学史研究评议

□李国华

从时代印记的角度而言，王瑶先生的文学史著作最明显的印迹是其基本的框架和体例。在基本的框架和体例上，《中古文学史论》和《中国新文学史》别开无二致。虽然两部文学史专著论述对象各异，研究者与对象的关系也有别，《中国新文学史》是“唐人选唐诗”，《中古文学史论》则是“宋人选唐诗”，但都是从政治社会情形叙述，次及社会风貌，最后论述作家作品，并且论述作家作品时侧重于主题和文体。在《中古文学史论》的自序中，王瑶先生表示：“我们和前面不同的，是心中并没有宗教宗派的先见，因之也就没有‘衰’与‘不衰’的问题。即使是衰的，也自有它何以如此的时代和社会的原因，而阐发这些史实的关联，却正是一个研究文学史的人底最重要的职责”。这种意见正是其文学史框架和体例的观念基础。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瑶先生依循唯物史观的理解将对文学作品的文体理解和美学判断都相对客观化了。不过，在具体的论述中，他似乎察觉到了这种历史叙述可能带来的局限，在论述中古作家的门第和文学成色的关系时表示：“我们当然不能依作者的门第品评作品的优劣，但作者在当时社会地位却是依他的门阀和官位而定；又文之事迹不能说毫无关系，但确乎是很微，是间接的。我们虽然不能说名门大族出身的人底诗文一定好，但文学的时代潮流的确是使他们领导着的”。由于注意到门阀官位这种社会政治现实与文学潮流的直接关系，王瑶的文学史框架和体例就免不了要论述文学流派及其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而由于注意到“文坛之事”与门阀官位关系“很微，是间接的”，他的文学史框架和体例就免不了要专章或专节论述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这就使得其文学史框架和体例具有辩证性，他也透过历史的针脚阐发作家作品的独立价值，而并不专在阐发文学与时代、社会的历史关联。

王瑶先生的上述特点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该书第二编“左联十年”(一九二八—

一九三七)中，“左联十年”的命名是具体时代的政治观念和时代气氛下的一种特殊表述，只能理解为左联起主导作用的十年，而不是左联存续了十年。该编第一章“鲁迅领导的方向”也应作相应理解，不是一个时期只有鲁迅起到了领导方向的作用，而是鲁迅的作用被特别强调了。但值得进一步注意的是，在这种明显露出历史针脚和时代印记的地方，王瑶先生并不只是在应和新民主主义论的革命史观，他凸显鲁迅其意义意味着凸显中国新文学史及左翼文学作为文学史的独立性。同样值得注意的，在该编关于文学现象的论述中，王瑶先生大体上采取了主题学分类法，尤其是第八章“多样的小说”，分为“热情的憧憬”“透视现实”“城市生活的面影”“农村破产的阴影”“东北作家群”“历史小说”六节，没有一节说明了“城市生活的面影”是不错的，王瑶先生也注意到了沈从文主要在写湘西，但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显然不是“农村破产的阴影”，而是将其视为在某种程度也在写“城市生活的面影”的作家，由此增添了有别于左翼文学的乡土叙事。王瑶先生强调沈从文“文字自成一风格”，认为他的才能使他在说故事方面比较成功。这种独具魅力的文学慧心，使得王瑶先生的文学史研究透过历史的针脚，留下了作家作品里人寻味的文学魅力，文学之为文学，到底是与作为科学的历史研究有所不同的。

事实上，即便在《中古文学史论》和《中国新文学史稿》的框架和体例下，王瑶先生在缝密历史针脚的同时，也发挥了他对于作家作品的体贴，展现了其文学之慧心。例如在《中国新文学史》中，他很大程度上借助了读者欢迎与否的角度来论述巴金小说的文学史价值，认为巴金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很健全”，“但在读者中所发生的影响说，仍是有积极的启发作用的”。这种论调在1957年写的《论巴金的小说》中延续下来，王瑶先生仍然强调巴金小说的社会影响大、读者多，客观上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精神”，但同时也颇多体贴之语，见出其文学之慧心。例如王瑶先生认为《新生》“以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而死”之类的表达独立成篇，“对于作者牺牲的积极意义就多少突出了一些”，而“作者也出生活本身，即情节开展的逻辑性来事实上对于那种单纯献身式的观点做出了一些批判”。这就对《新生》的形式和巴金的心理颇有体贴。又如王瑶先生在依着巴金自己的小说写“性格”说分析“爱情三部曲”时表示：“就小说的动人程度和艺术天才的慧心而言”。

最好的例子也许是王瑶先生对鲁迅的研究。在《中国新文学史论》中，王瑶先生首先勾勒鲁迅文学的思想价值和战斗地位，认为“鲁迅从他的创作开始起，就是以战士姿态出现的，他一面阐发着社会丑恶的一面，一面也表现了他的改革愿望和战斗热情。在这两者的统一上，不只他的作品的艺术水平高出了当时的作家，就在思想性的强度上也远远地超过了当时的前

更更新、转换、发展的过程。王瑶去世前最关心的学术课题《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或许最能体现他一贯的追求和格局。

诸多研究都重视作为学者的王瑶，主要关注他的学术著述，但同样值得提及的是作为学科组织者和文学教育家的王瑶。他不仅是1950年代现代文学初创时的奠基人，也是1980年代学科重建时期的灵魂人物。在人才培养和学科体制建设上，可以说王瑶也奠定了近四十年来现代文学学科的基本格局。这也是王瑶作为文学史家的第四个特点，即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并重。从人才培养上，“文革”结束后，王瑶将自己的精力主要集中在指导研究生和从事学术组织工作上。他上世纪50年代就作为学科带头人，与乐黛云、严家炎、孙玉石等晚辈一起奠定了文学学科的基本格局，并在上世纪80年代培育出了一大批现代文学学科的中坚力量，如钱理群、温儒敏、陈平原、吴福祥、赵毅、凌宇等；从学科机制建设上，王瑶主持筹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担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这个社团和这份刊物，成为四十年以来联合、组织高校现代文学研究者的重要平台。

以上列出了作为文学史家和现代文学学科建设者的王瑶的四个主要特点。这种特点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特别是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相关学科的主要风格。一个人如此深刻地影响着一个学科，堪称难得。“大先生”在学科体制内推进研究和完善建制，是不少专业研究者都能做到的，但创设学科机制、继任并开来，则非“大先生”所不能为。

当前，正处在建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新时代，这需要我们突破者思维定式，立足中国主体性视野，重新思考古今、文与史、传统与现代、学术与学科等的根本性关系。王瑶的治学道路与学术贡献，尤其是他参与建构现代文学学科丰富的历史传统，为今天重新出发提供了格外富于现实意义的资源和经验。在这里，我们“现代化”并不是外在的目标，而是立足中国文学的主体性而完成自

面。当作文化革命的旗帜，三十年来多少进步的作家都是追随他的足迹前进的”。这种看法和着新民主主义论的革命史观，“艺术水平”近乎“思想性”的附庸，似乎不值得有论述。但王瑶先生显然清楚自己的文学史论述受制于具体的框架和体例，此后再《鲁迅对于中国文学遗产的态度和他所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论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论(野草)》《(故事新编) 杂论》等一系列除人口的名文中留下了一个文史大家对于作家作品独到的体贴和会心。除了学界早有颂扬的一些文章，如王瑶先生发现《孤独者》中的魏连锡与魏晋人物阮籍、嵇康的行迹和精神关联，发现《故事新编》的“油滑”与二丑艺术的关联，王瑶对《儒林外史》和鲁迅小说之关系的理解，也是发人深省，足见其文学慧心的。在《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一文中，王瑶先生谈到鲁迅推崇《儒林外史》的原因包括“士林”风习的深切体会、讽刺艺术的热爱及小说结构的接近三个方面，其中关于小说形式结构的分析尤为精到。他认为鲁迅技巧圆熟的小说《肥皂》《离婚》与《儒林外史》一样是“事与其真俱起，亦与其去俱论”，而《阿Q正传》《孤独者》等首尾毕具，人物性格随着情节的发展而展开的作品中，那种以突出的生活插曲相互连接起来的写法也不是传奇体或演义体的，而更接近于《儒林外史》的方法，这就对《儒林外史》的深刻性，有了更重要的意义。王瑶先生表示：“鲁迅小说的形式影响，因为它只是短篇，并受外国近代短篇小说的影响，因此在向民族传统去探索时，就更容易受到《儒林外史》的影响了。”这就堪称神来之笔了，鲁迅小说自身的历史不仅关联着“外国近代短篇小说的影响”，而且关联着《儒林外史》标识的民族传统；而在中西交汇处，鲁迅小说获得了其自身的历史。这是真正的文学史研究，一切历史的针脚，不正是隐是显，都不那么重要了。”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任教清华时期王瑶(二排右二)和同事们们的合照

循环和追忆王瑶先生，根本的意义就是纪念并延续王瑶先生等现代文学研究第一代学人开辟的学术传统。我们透过王瑶先生的学术生涯看到的是现代文学学科建设走过的历史足迹，是现代文学学术谱系的开闢与发源，是现代文学研究这棵学术之树最坚实、最厚重、最具影响力的根脉。今年是王瑶先生诞辰110周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45周年，王瑶先生是学会的首任会长，其开山之姿、奠基之力、定鼎之功是我们学界同仁永远崇敬和敬重的！今天我们纪念王瑶先生，从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方面看，有三点特别值得关注。

古今之通

王瑶先生的文学研究视野宏阔，以历史性的眼光贯通古典文学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王瑶先生以中古文学特别是魏晋文学为研究的起点，他对魏晋文人、文论、文学史的考察，不仅以具体的文学现象为依据，而且注重发掘文学复杂枝蔓背后的规律性。这段研究中古文学的经历形成了王瑶先生研究现代文学特殊的底蘊和视野。事实上，王瑶先生之所以以魏晋文学为治学起点，与现代文学颇有渊源。他受到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的引导和启发，选择魏晋文学为研究对象，他的《中古文学史论》一书在方法、思路 and 述史原则上，同样受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中国文学史) 小说二集序》等著作的启发和影响。因而，王瑶先生1949年转向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实则是一种精神上的延续、学理上的贯通。王瑶先生的现代文学研究“一出手就是高峰”，不仅因为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系统、全面地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30年的历史，起到发凡起例的奠基作用。更重要的是，王瑶先生的现代文学研究，实则是对魏晋风度从“文”到“心”的深切契合。魏晋风度是王瑶先生一生治学的写照。魏晋风度以其超然物外、独立思考的精神理，深深影响了王瑶先生，他的文学研究充满了个性与独立思考的精神，他的文章在字里行间显示出一种文学的敏感与逻辑的细腻。魏晋名士的自觉、自主、自在，王瑶先生的笔端与心间化为一种力量和风骨，五四一代人的责任、信念、担当，让他即使在时代的洪流里依然紧紧抓牢现代文学研究的船舵。

见树又见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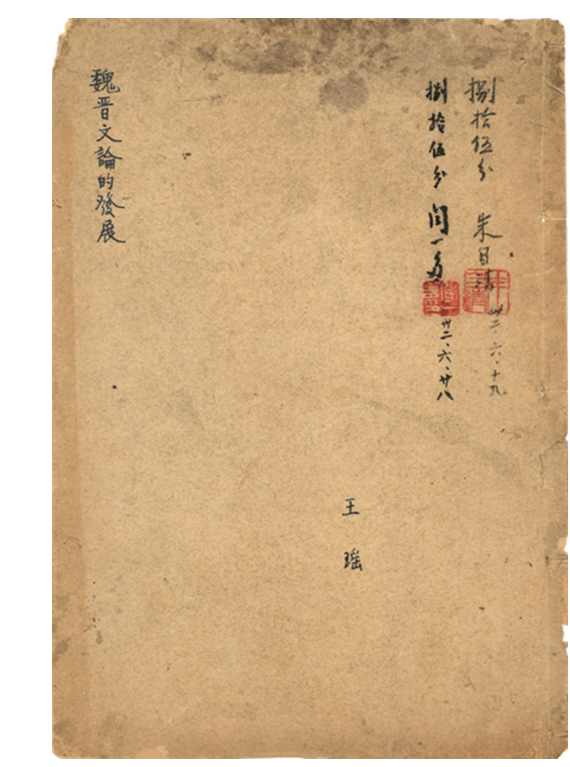
王瑶先生准确把握了文学研究宏观与微观的双重视角，彰显出内蕴雄厚、开拓深远的思辨之力。1988年，在武汉召开的全国“鲁迅研究教学研讨会”上，王瑶先生用“见树不见林”和“见林不见树”来形象地比喻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点透了两类研究方法的特质与局限：他说“林”不是树的简单叠加，但是“见林不见树，黑压一片，究竟是林还是着了火也搞不清，那就不好”。王瑶先生的文学研究，正是兼及文本幽微处的光亮与历史时势的大潮，兼顾了树的独特与林的伟大，用一只充满智慧柔软的大手，既把握了研究的方向，又体贴了文学的真实，常常给人入木三分之感。王瑶先生在《论现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中，以具历史感的宏阔视野把握现代文学在古今之际、中西之间的交错、融汇的发展历程，既肯定了新文学的“现代”，又提出新文学从民族文化传统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得到的滋养，因而具有民族性的特质；又以具体的文学体裁发端论述现代文学鲜明的民族特色，结合四大文体变迁过程，牵引出现代文学背后如影随形的古典文学资源。王瑶先生以通论古今中外的魄力，不仅看到了现代文学一棵棵形态各异的新树，还看到了现代文学这片复杂茂密的林，更看到了与这片林交织辉映的古典文学之林、外国文学之林。王瑶先生的眼界开阔，他曾借鲁迅的《由聋而哑》一文强调“如果拒绝学术，借鉴多种多样外来文学作品的声音也会变‘哑’”，他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体变迁、语言变革、译介活动等多个维度肯定了外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影响。他研究现代文学，却能跳出现代文学本身，打破唯一性的论述，王瑶先生对古典文学的熟谙，对外国文学的涉猎，让他的现代文学研究更加从容，这也是那一代前辈学人共同的治学底色，他们或有古典文学研究的背景，或曾经从事文学理论、外国文学研究、文学创作，但相同的是，他们都已巨大的包容性，共同集结成了现代文学学科的精髓，这是我们心向往之的研究境界。

大树之大

唯有认识到王瑶先生学术贡献的开创价值、宏伟气象和历史影响，我们才能真正贴近、走进他的世界，深切感受到王瑶先生这棵大树带给我们的指引与庇佑。王瑶先生的研究称得上“开天辟地”，他是现代文学学术谱系的第一代教育者、研究者、探索者、创建者，是现代文学学术史的第一章。王瑶先生的研究涵盖了从古典文学到现代文学的广阔领域，深耕文史的史学传统、诗歌研究、社会批评等各个领域，触及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在研究的纵深、维度、视角、方法上都有所建树，学术世界深邃而广阔。王瑶先生的学术遗产对我们来说是一份宝贵的财富，也是一种激励和挑战。我们不断地与王瑶先生的学术成果对话，在探索、创新和思辨中，不断深化对现代文学的理解，在王瑶先生等第一代学人的基础上继续前行，不断开拓新的学术领域，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贡献新的力量。曲折的人生经历和敏感的心灵使得王瑶先生始终具有责任感忧患意识，也同样让王瑶先生执着地守卫文学信仰的纯粹，守护学术热土上的生机，守护文学青年的成长。我再次想起当年王瑶先生去世时，钱理群先生所感慨的“大树倒了！”这四个字既是对王瑶先生及他那个时代不可挽回的结束的深切慨叹，也是对后继学人“如何奋力前行的沉重自责与自我鞭策”。“敢蒸时艰，烟斗常衔”是王瑶先生的自画像，这幅画像背后是王瑶先生等第一代学人以大树的姿态撑起现代文学研究的那份郁郁世界。我们怀念王瑶先生等大树奠基人，沿承他们的参天树根，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树荫婆娑不绝，绿意亦会盎然不断！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本专刊由《文艺报》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合办



王瑶先生撰《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手稿



《魏晋文坛的发展》手稿